孙颙:从自己写到他者

◆ 王瑜明

他被称为“丽娃河畔走来的作家”,因为他是华东师大作家群的一员;北京评论家贺绍俊称他为“从《雪庐》走出来的现实主义作家”,或许更鲜明地指出了他的文学特征:把知识分子的命运作为创作的主要标的。他在“文革”期间当知青时就开始写作;他气质儒雅,从他身上能感受到厚重的东西;他关注并涉及的写作范围很广,从文学、文化到音乐、艺术、社会问题,甚至世界时局和金融问题也有所涉猎,他就是原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、原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,孙颙。“五一”前,《收获》将发表他新写的长篇小说《缥缈的峰》,上海文艺出版社也会出版此书。接受采访时,孙颙分享了他的小说创作经历,谈起创作,他说他“从自己写到他者”。

图 IC

知青生活

孙颙透露,《缥缈的峰》写了四代人,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追求。从辛亥年间的知识分子,一直写到“80后”。“主要是写当代,把过去作为人物命运的背景和故事发生的缘由。”孙颙说,“写当代生活着眼于复杂和新鲜。例如,把黑客与商战纠葛起来写,几位数学高手卷进了数字时代的焦点。谈及新作,孙颙希望这部小说体现了目前的艺术追求,尽量写出当代生活复杂的人物和丰满的故事,同时努力包含有启示性的哲理。这是他沿着从写自己到写他者迈出的又一步。

孙颙说,多数写小说的人都是从写自己开始,然后进入写自己比较熟悉的故事和人,他最早写的就是自己的知青生活。“1974年时,上海出版社的招待所里面有王周生、我、叶辛、张抗抗等知青写作者,我和王周生从上海农场过来,张抗抗是黑龙江的,叶辛来自云南。我们一开始都是写自己。”孙颙写自己的过程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。

在同行和好友眼里,在农场工作生活的那段时间,孙颙似乎从没有以泄愤或者控诉的态度参与知青文学运动。到农场不久,孙颙就被任命为一个大班的班长。“那时我干活拼命,谁干活拼命就当头。那个时候当干部就是吃苦,我一直当到生产连长。别看我现在文质彬彬,所有苦的活我都能干。”孙颙笑言。1972年,在农场干活的孙颙把身体累垮了。“那个时候是以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保尔柯察金为榜样,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,休养了11个月,在那11个月里,我读了大量历史的书籍。”孙颙说,就在那时,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,不再是个懵懵懂懂、盲目、头脑发热的年轻人。

1976年初,当时市里想组织一个以批判大官走资派为目标的创作组,领导要调孙颙去。这对他而言是诱惑也是考验。那时大家都是知青,被上面看中就可以离开农村,但孙颙对“文革”和那些新贵已经有批判的意识,他用了“拖延战术”,坚持不去报到,一直拖到“四人帮”粉碎。

冬的回忆

1977年,高考制度恢复,孙颙告别了他曾经生活过10年的崇明前哨农场,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。孙颙曾说:“在社会中度过了长长的喧嚣的日子,才明白,宁静的校园生活是何等可贵!”1978年进入大学后,除了上课,他就忙着去图书馆抢座位。“文革”期间,由于没什么可阅读的书,刚进大学的孙颙就日夜泡在了图书馆里。那里有许多“文革”前出版的书,都是他曾经想也不敢想能读到的书。大约半年后,他的心却不安静起来,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渐渐占据了头脑。他想写一部关于同龄人命运的小说。写他们从狂热参与“文化大革命”,到慢慢清醒过来的曲折的历程。

1978年夏秋之季,在华东师大校园里,孙颙思考着近十几年的风风雨雨,回味自己这代人经历过的林林总总。正巧,那年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一个月左右的社会调查。白天在市中心调研,趁学业不太繁忙,孙颙每天晚上就回五原路的老家写作。家里有个三四平方米的小屋,狭窄、斜顶,透气依靠直径仅半米的圆形小窗,但这成了孙颙的福地。每天吃过晚饭,他就躲进小屋,至少写5000来字才肯上床。二十多个长夜一天不歇,终于在冬天,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冬》诞生了。

这是一部批判“文革”的作品,当他拿着那叠写在粗糙的方格纸上的小说,去找几位文学编辑,询问是否达到出版的水准,得到的答复基本都是:小说具有感人的力量,但是,涉及不少敏感问题,目前出版有困难。面对接二连三地摇头,孙颙有些气馁。

1978年岁末,孙颙意外听到一个消息,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位领导韦君宜和屠岸到了上海,他们此行的目的,是想寻找几部“大胆”的新作品。在一个寒冷的雨夜,孙颙忐忑地把小说送到了他们在上海的下榻处。原本以为要经历漫长的等待,却意外在1979年初就收到了回信,信里充分肯定了孙颙的那部长篇小说,并邀请他去北京参加中长篇小说的座谈会。在那次会议上,孙颙认识了王蒙、陆文夫等前辈,并从他们的人生经验中获得了众多的教益。

回到上海,又折腾了大半年,孙颙才终于拿到装订成册的《冬》。这是他的第一本书,是文学道路真正的开始。1988年,孙颙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,尽管那时他已出版不少小说,但那里收藏的他的著作只有《冬》。

▶ 孙颙作品

文人淡定

毕业那年,孙颙32岁了。他进了上海文艺出版社,成了一名文学编辑,参与了《小说界》与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的编辑工作。1985年,老社长退休,大家一致推选孙颙担当社长。对孙颙来说,他并没想过要成为行政人员,只想做一名好编辑,继续小说创作,因为写作已经成为他的习惯。那些日子,他白天在出版社为别人的创作校勘,晚上则在家中奋笔疾书,常常写到深更半夜。“我的多数长篇小说都是1985年以后完成的。”

上世纪90年代,孙颙完成了三部小说,《雪庐》《烟尘》与《门槛》,分别回顾了知识分子家族史,描绘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境况以及知识分子对新世纪的迷惘与困惑。2005年,这三部作品被集结成册,以“知识分子的一个世纪”为主题重新出版。

说到《雪庐》,孙颙说,那是很真实的一种人生感受。“最早触动我的、故事的原型就是我外公。外公教我唐诗、宋词、围棋,但他实际上教会我的是一种态度。文化人在任何厄运面前是很淡定的。后来我在小说《烟尘》里面写,任何苦难终究会过去,非理性的社会一定会恢复到理性。这就是外公给我的文化传承,要淡定。”有人问孙颙,写的小说是否真实,他坦言:“也许小说里有一些话是违心,但文化的基本内涵是真的,是从我外公那种文化人传下来的。”

然而,很少有人知道,那一阵他在工作各方面均遇到很大的麻烦,孙颙创作《雪庐》是在他非常痛苦的心境中开始的。“我突然感到大概除了写作,没有任何事情能平息自己的心态。我终于在年初一的早上,外面鞭炮很响的时候,开始写了《雪庐》的第一个字。”孙颙回忆,“有些作品的创作是在很苦恼的时候、无法排解时,甚至觉得未来很迷茫时,用所有可能调动的感情投入到文字上去。”《雪庐》的最后几句感想是这样的:“难得清醒,难得糊涂,难在清醒与糊涂之间。”

写作计划

可以说,写作从未从孙颙的生命中褪去。在思南读书会首场活动中,有读者问起他未来的创作计划,孙颙说:“去年整整一年完成了一部20万字的小说,当然,结构这作品的时间要长久得多。感觉包含了一些我新的想法。但我也坦率地承认,我还有很多想法、生活,现在还不能写。哪怕声明只是纯属虚构,没有对号入座,也没有用的。这方面我还没有放开。”他说,他还有很厚的生活积累没有动用,可好好写。“我一直觉得60岁以后不抓紧写,到七八十岁就写不动。所以现在要抓紧一点。”

至于除了小说之外,为什么会写涉及历史、科技、经济等各方面的随笔,孙颙坦诚地说,得益于几十年做出版工作的近水楼台,有看不完的各类读物。他没有多少爱好,桥牌、围棋等,只是偶然玩玩,天性不爱应酬,业余时间大量阅读,阅读是生活开心所在。阅读、思考、写作,使人生充实。

在孙颙眼里,如今的“80后”创作完全有可能成为转型的力量,催化出新兴的写作模式。“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思考与写作。当年我们写知青小说时,也有人提出负面的看法。但如果没有‘知青小说’,可能文学界还处于‘命题小说’的藩篱中,文坛也不会那么活跃。”孙颙说,“80后”都是独生子女,在家里面有父母的期待,在社会上又面临激烈的竞争,网络时代的兴起增加了他们的言说方式,他们完全能拥有自己这个时代的文学。